

老方桥、万石桥、牌门李…… 这些地名记录着宁波学子的悲喜故事

漫漫人生，高光时刻总是稀缺，不付出相当努力，往往不会轻易出现。有意思的是，在地名中，也能发现这种高光时刻，它们记录着宁波不同时期学子们的悲喜故事。



贤良巷以清代史大成状元而名（图片由作者提供）

徐雪英

在古代，对于普通学子而言，考取功名是改变命运、提升阶层的大事。一旦成功，不但家人欢喜，连邻人、县人都会觉得脸上有光。

余姚阳明街道有老方桥，原名方桥，因与奉化方桥重名，冠“老”以示区别。光绪《余姚县志》引《万历志》记：“方桥，亦曰新桥，旧跨长冷江，曰长冷桥，又名方桥。”至于建桥原因《孙境宗谱》有解释：“方桥，四明孙子秀之甥方山京，读书于此，后中状元而建，因名。”方山京，南宋余姚梁弄人，幼年孤苦，家贫无依，一度寄宿亲戚家。宋景定三年（1262年），寒士方山京竟考取了当年全国进士第一名，登壬戌科状元宝座。

中状元后，方山京回乡省亲，为报答余姚百姓，特在长冷江读书处建桥一座。百姓遂称此桥为“方桥”。传方山京回余姚期间，余姚县令为庆贺他中状元，特意包方形粽子馈赠民众，让全县百姓同庆本地状元的诞生。后方粽成为余姚民间特色小吃，有“包中”之谐义。

阳明街道还有万石桥，光绪《余姚县志》记：“万石桥，宋侍郎孙嵘叟建。”《孙氏宗谱》详释，孙嵘叟先祖孙玘原居庆元府定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后到余姚做官，遂把家迁至余姚开元乡，成为当地孙氏分支先祖。宋淳祐年间，孙嵘叟考

中进士，又累迁礼部侍郎，孙家人就在开元乡建了万石桥，取孙氏食禄万户之意。村袭桥名。

充满自豪记忆的还有五桂楼。五桂楼坐落在于余姚梁弄下街学堂弄，是清代藏书家黄澄量的私人藏书楼。《黄氏宗谱》记载，后唐时期黄定远最先定居梁弄，到第六代黄远美时，达到顶峰。黄远美有儿子八个，五个先后中举登科，家族富贵昌盛一时，号称“五桂”。后五子衣锦归乡，宋高宗还以《五子还乡》诗相赠，传为坊间美谈。

黄澄量建藏书楼时，便以这段家族传奇取名“五桂楼”。五桂楼藏书最多时，达6万余卷，有“浙东第二藏书楼”之称。其中《明文类体》在清朝文字狱时期存了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议，最为史家看重。因五桂楼周围有七十二峰四明山峰环绕，亦称“七十二峰草堂”。

和梁弄黄氏家族类似传奇的还有余姚洋山邹氏家族。洋山邹氏始祖据传是南宋常州人邹植。邹植应举不中，隐居会稽郡，后人赘余姚莫氏，定居余姚低塘洋山之南。《邹氏宗谱》记，邹植后裔恪守家学，重视读书功名，多登科进士。至十二世孙邹儒时，登明成化年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其子邹轩，登弘治九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擢兵部给事，迁刑科都给事，居官十二年。父子皆进士，族人尤光彩，于是立了牌轩于村中，村遂得名“牌轩头”。

鄞州区五乡镇有牌门李，村民主姓李，传南宋绍兴年间，刑部郎中李珏之子李义迁此定居族。到明朝嘉靖时，后裔李云考上了进士，家人特别高兴，在村前建了一座进士牌坊以贺。后来牌坊成为村庄地标，俗称“李家牌楼”，村庄也随之叫做“牌门李”。2008年旧村改造，牌门李村迁入汇纤村李都锦苑。

鄞州姜山镇有走马塘，始建于北宋端拱年间。因村中多出进士、官吏，为方便走马行车，沿河砌石为塘，故名走马塘，村以塘名。现村中仍保留不少明清建筑，有陈氏宗祠一座，正厅高挂“历代进士总目”，柱联显镌“祖孙三学士，父子二侍郎”，满满都是这个家族高光时刻的自豪记忆。2010年，走马塘村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鄞州东胜街道有贤良巷，以清朝宁波第一位状元史大成而得名。史大成，字及超，号立庵，宁波鄞县人。出生于农耕之家，自幼聪颖好学，明崇祯十三年第一次考中举人。因明末政权动荡，便未再继续进考，在家乡以授课为生。清顺治

年间，第二次参加举人考试，再次考中。继续参加京试时，被主考官拟为第三名探花。但顺治皇帝看他考卷时，认为其“文气光昌，字法敬慎，必端人也”。特别提拔他为第一名状元，成为当年最好运最传奇的考生。

不过史大成也没辜负顺治皇帝的赏识，他为官政绩卓著，为民孝顺父母，还被后来的康熙皇帝赐“贤良方正”匾额。贤良巷便由此而来。史大成不但是清朝宁波第一位状元，也是清代浙江第一位状元。因为清朝浙江最后一个状元姓钟，浙江民间就有浙江清代状元“始于史，终于钟”的有趣说法流传。

三

海曙西河街白衣小区有“状元厅”，以宁波最后一位状元章颔而闻名。章颔，字骅芝，号采南，海曙西河沿人。自幼聪颖，饱读诗书，21岁中举人，29岁中状元。中状元后，为母养老，章颔特意在西河沿建宅，时人称“状元厅”。20世纪90年代，宁波旧城改造，状元厅迁入天一阁。

宁海一市镇东岙有西潘自然村，传明嘉靖年间潘姓自本县冠庄迁此定居。因村处西水桥头，潘姓居住，故称西潘。东岙《王氏宗谱》记，该村原为王姓居住，元代时王应子长子王于赉考中状元，可惜未职而殁。至今，当地还有状元亭、状元街等遗迹残存。

像王状元那样不幸的，还有慈溪鸣鹤镇人虞九皋。虞九皋，字鸣鹤，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孙子。唐元和年间考中进士，可惜仅年余即歿于京。虞九皋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交好，他去世后，柳宗元作《虞鸣鹤谏并序》以寄哀思。为纪念虞家这位不幸的进士，族人用其字“鸣鹤”冠以乡名流传至今。

哀伤的还有宁海桑洲陈姓进士。《宁西陈氏宗谱》记，南宋淳熙五年，原籍平湖桢心乡的陈室考中进士，后不知什么原因由评事谪降昌化县尉，再降宁海驿丞。他的儿子跟着他一路谪降来到宁海桑洲，成为桑园陈氏分支始祖。因该村庄古时多桑树，故称桑园。桑园陈氏后裔后又分居上山陈、下沙地等。

类似伤心的还有鄞州云龙镇前徐村西来庵的原主人。西来庵建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据说是某位状元夫人的清修之地。该夫人虽有状元夫君，却不甚称心，后隐居庵中念佛清修，以避俗人俗尘。因佛教传于西域，故名西来庵。

宁波地名谭

三

技术员们深感懊恼，无数次想过要放弃，可是就此放弃的话，文明的推动也将戛然而止。虞洽卿亲自给技术员打气，让他们务必坚持，同时保持谦逊态度，并就如何让市民摆脱迷信的束缚、接受科学发动员工积极开动脑筋。

那时候没有电视，报纸所能抵达的受众也以“文化人”为主，思来想去，除了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街头摆摊宣传和挨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作依然是理想的选择。自此，永耀电力公司的技术员们走上了一条漫长的“电力科普之路”。

好在过程虽然艰难，但结果是美好的。由于技术员的倾力宣传，电灯的应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仅仅两年时间，很多家庭使用电灯取代了煤油灯。永耀电力公司输出去的电灯，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城市的用电范围只局限于电厂附近区域，主要作为江夏商业地带照明之用，那么到后来随着宁波近代工商业的快速发展，电力工业的发展受到刺激，供电范围进一步扩大，推动了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南北交通线遭到破坏，永耀电力公司的燃煤来源困难，不得已改烧木柴，经营出现亏损，每况愈下。1941年宁波沦陷，材料配件、流动资金等因货币贬值亏损殆尽，永耀电力公司遭受重大损失，苦苦支撑到抗战胜利，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

1949年5月宁波解放，此后的30余年间，永耀电力公司一直是宁波市的主力电源。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拥有百万千瓦机组的镇海发电厂建成，宁波发电厂（即前永耀电力公司）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84年撤销。



潘玉毅

说到宁波有电的历史，就不得不提一个人物——虞洽卿。

作为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人物，1914年年底，事业有成的虞洽卿在宁波成立电力公司，周仰山、孙衡甫、刘鸿生、戴瑞卿等一批经济实力强大的企业家纷纷响应，成立“商办宁波永耀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所以前面冠以“商办”二字，是为了防止被官僚资本掠夺而收归国有。

1915年2月6日，农历小年夜的前一天，永耀电力公司的发电厂建成发电。选择这样一个日子发电，电力公司的决策者们显然是有考量的。小年虽不是过年，但在民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传统的祭灶日，有扫尘、祭灶等习俗，同时对新年的即将到来有预示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发电，也表达了“新时代即将到来”的深层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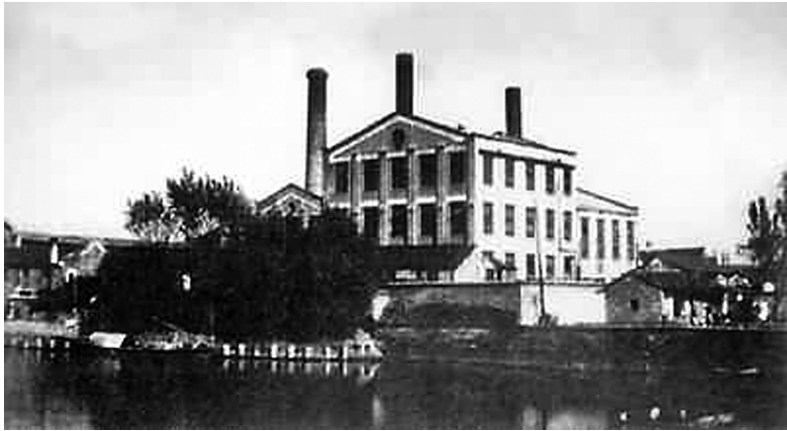
一

永耀电力公司的发电厂在北门外北斗河畔。1914年刚建厂时，发电机容量只有50千瓦，只能点亮500只100瓦电灯。

冬天的天色暗得早。傍晚时分，夜幕悄悄降临，忙碌了一天的市民回到家中，陆陆续续地点上了煤油灯，开始生火做饭。这时，县前街、杨柳街、镇明路附近的一些商号民居里，突然齐刷刷地亮起了电灯。

因是电灯的光芒有别于煤油灯、蜡烛带来的光亮，故而吸引了大批居住于附近的市民前来围观。在今天看来，这些电灯发出的光只能用昏暗来形容，但在当时，却是“天赐焰火，如大光明”。正在用餐的人们连饭也不吃了，纷纷放下碗筷，从家里跑了出来，争相来见识

“永耀”划时代 “点灯不费油”



北斗河畔的永耀发电厂（资料图片）

“点灯不费油”的奇特场景。

然而，看过之后，好奇之心和赞叹之意虽有，真正有意愿装电灯的人却不多。那时候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很匮乏的。放眼整个浙江，在宁波以前，只有杭州有发电企业，宁波虽有一条街名为“开明街”，人们的思想却没有那么开明。于大多数的市民而言，电是陌生事物；对于陌生的事物，人有一种天生的抗拒。他们不懂电为何物，四下里一打探，听说触电还会死人，似懂非懂之间，以讹传讹，对于安装电灯和用电的兴趣也就越发地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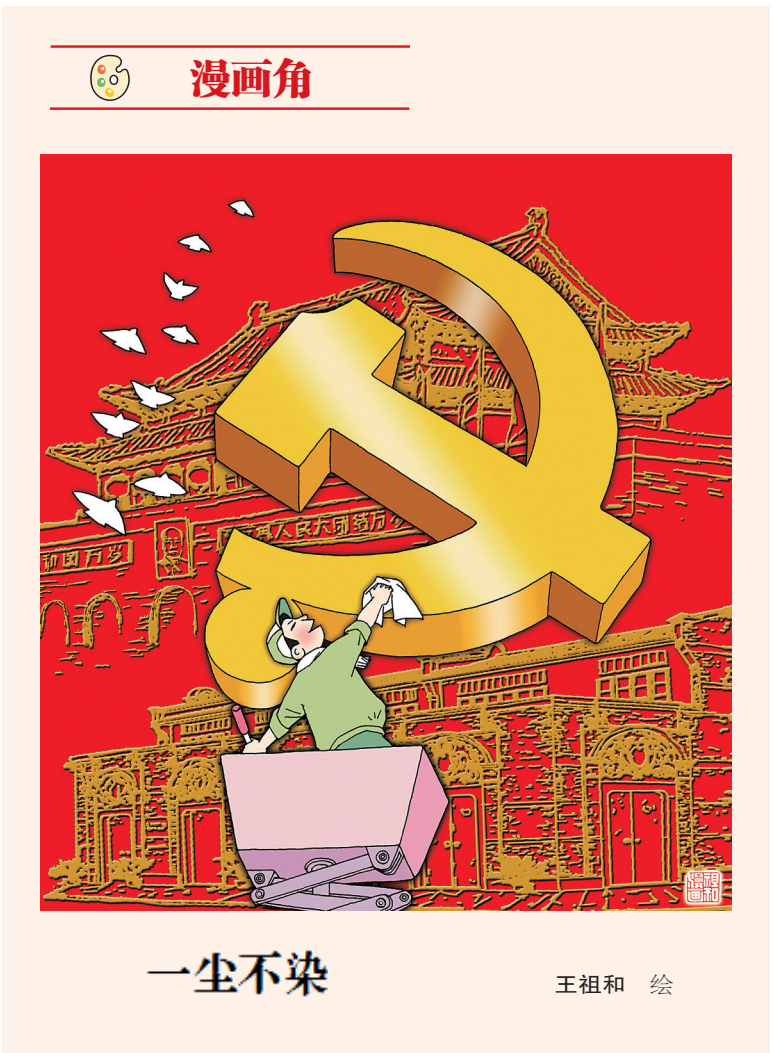
二

虞洽卿和永耀电力公司的筹办人，原以为借着小年夜的契机，能够一炮打响，谁知看到的却是响应者寥寥的结果，失望的同时未免有些疑惑。他们派人前去街坊四邻处了解、寻求答案，得知原因之后，为了消除市民的顾虑，扩大用电业务，决定让技术员上门宣传用电常识。或许，论资排辈的话，这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电力科普者”了。

科普，看似只有短短两个字，做起来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与文字的简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把新的知识和意识灌输给那些本不具备这些东西的人。每当有新事物、新观点出现时，人们总是会怀疑，怀疑它的作用，怀疑它的价值，怀疑它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否则也不会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说了。

而且在江浙一带，民间有“魂灵”一说，譬如照相机出现时，迷信的人们就常说“不能拍照，相机快门一按，会把人的灵魂推出躯壳”。对于电灯，他们的态度同样如此，看戏一样看热闹可以，但要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安装这样一个东西，他们是不接受的，甚至相当排斥。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电力知识的科普是何其的艰难。永耀电力公司的技术员第一次上门时，大多吃了“闭门羹”，通常才说了两句，话就被打断，后面的三四五六七八句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若是遇到客气一点的市民，寒暄过后，还能讲上三五分钟，完成一些简单的介绍；遇到不客气的，就直接被拒之门外。



一尘不染

王祖和 绘

竺清旦：宁波“农运大王”

俞 跃

“可怜种田人，依呀呀得儿喂，穷苦劳碌命。”一首《可怜种田人》，唱出了农民的苦。这是出生于奉化农村的竺清旦（1899—1935）对自己所生活时代的真实写照，他一生致力于通过农民运动改变农村、改变中国的原点也基于此。

竺清旦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这条道路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的教育救国思潮，深深影响了他。这位曾经的老师、校长，一度将国家前途运寄希望于教育，特别是少年儿童。“教育救国”方案的破产，使他逐渐意识到政治上的问题，比教育问题更为迫切，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才是救国的正确方法。

竺清旦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投身于中国工农革命的洪流中。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竺清旦的革命干劲更足了。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主张。而这一想法，竺清旦在实践上先行了一步。在宁波党组织的领导下，竺清旦通过在《时事公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宁波江东肥料公司垄断肥源、高价售卖、侵害农民利益的恶行。他深入鄞东农村一线，特别是在1925年6月，在青山庙、忠嘉旌庙主持农民代表会议，决定以实际行动对抗肥料公司，开展反垄断斗争。

竺清旦带领3000多农民，向警察厅请愿未果，又转向肥料公司。农民的革命热情被点燃，肥料公司的资本家狼狈出逃，警察厅宣布取缔肥料公司，农民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竺清旦领导农民斗争的胜利，也是我党在宁波地区领导开展的最早的农民运动。

1925年7月，竺清旦因势利导，在鄞东领导建立了五魁村青山庙、邱隘村梓木庙两个农民协会。这两个基层农民协会的建立，是在农民斗争中形成的，农民从中看到了联合起来的组织力量。这一宝贵的斗争经验，也使竺清旦更清楚地看到了建立农民组织，发动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特别是中共宁波地委成立后，专门组建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竺清旦成为全宁波地区农运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对鄞县、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奉化、余姚等县进行了具体的工作指导。

他在余姚办起了第一个农民夜校，后又建立了余姚盐民协会。他率先垂范，要求鄞县、奉化、慈溪等县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应当说，竺清旦的这一系列革命实践，助推了宁波农民运动的发展。

担任宁绍台农民协会会长，是竺清旦领导农民运动的另一个重大事件。1926年12月成立宁绍台农民协会后，他任命了一批宁绍台农民协会负责人分赴各地工作，组织建立农民自卫军。这一系列的做法，与他1926年5月在广州参加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是分不开的。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不仅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的演讲，还有幸到农运大王彭湃的家乡海陆丰等地学习取经。他明白了农民要组织、农会要建立、

农运人才要培育，农民运动的开展必须结合本地实际，他采用以会代训的办法，广泛印发资料，指导宁波各地的农民运动。

他深刻认识到“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武装，农民协会就不能巩固”，于是策动姚北水巡队长费德昭起义，并在相公殿建立了“浙东人民自卫军”，这里后来打响了浙东敌后抗日第一枪。此后，宁波多地有多支农民自卫军组建起来，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快速发展。到1927年4月，宁绍台地区有组织的农民已有20余万人，竺清旦领导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

但这一大好的革命形势被蒋介石扼杀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1927年4月9日，宁波发生了“清党”事件，王颀、杨眉山被捕，宁波总工会、宁绍台农民协会相继被毁，宁波临时政府被解散，竺清旦等共产党员被通缉捉拿。闻讯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竺清旦出走武汉。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竺清旦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竺清旦（1899—1935）

在武汉时期，竺清旦不仅参加了张秋人、经亨颐等人主持的训练班，还参加了1927年6月在汉口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可是，随后汪精卫就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党组织将竺清旦等送到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竺清旦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军事理论，随时准备回国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竺清旦在苏联学习期间，和王明（原名陈绍禹）同校。因竺清旦向所在学校提出校内存在的一些问题时，得罪了王明，对方诬称竺清旦是中山大学校内托派（“托洛茨基主义”派）组织的组长。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经过调查，组织上为竺清旦予以了澄清。

1930年10月，竺清旦从苏联回国，在新疆开展群众工作。后被安排在民国军阀盛世才的教导团工作。在疆期间，竺清旦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开展革命活动，招来盛世才的嫉恨，于1935年遇害。

竺清旦的一生，都与革命斗争相关，与宁波的农民运动相连，他建农会、创农协、夺武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赵世炎夸“宁波农民运动搞得很好”，老百姓则称竺清旦是宁波“农运大王”。

（作者为浙江万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